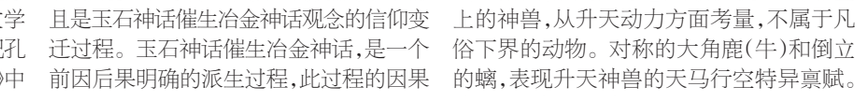

中华文明探源

编者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多学科联合攻关深化了对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的认知。本版的两篇文章立足文学人类学，围绕中国性内涵，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大一统基因以及精神信仰的起源及延续性问题。

文明探源的交叉学科视角及方法论创新

□ 叶舒宪

文学人类学这个新兴交叉学科有一个特色传统，即数十年坚持打通文史哲、艺术、宗教和政治的跨学科研究取向，努力追求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建构。2009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室将国际上已经体现综合学科优势的比较神话学范式，引入到我国的文明探源工程，开启中国社科院重大A类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该项目内容为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借鉴国际上以神话学探究文明起源的经典性成果，组织翻译引进一批英、日文著述，其研究对象包括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克里特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日本、韩国文明等。其二是梳理百年中国神话学的探索经验，特别是在上古史与考古学结合互动方面。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一种文明探源的交叉学科范式，让考古新发现与文化阐释形成有效对应，期望从神话信仰的还原性认识中，筛选出文明发生的精神动力要素，让文明探源研究能够探查、触摸到中华文明独有的灵魂。

四重证据法：新时代国学研究创新

“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立项时拥有的研究工具利器，是1993年提出的三重证据法和2005年提出的四重证据法。国学传统的基本方法论是考据学，并以考据学为基石，总体划分为考据、义理、辞章的三分格局。在王国维1925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前，国学考据学的基本格局围绕着传世文献，两千多年没有大的改变。王国维之后，国学方法更新换代的契机屡屡出现，文化人类学整合视野的引进，是催生二重证据之外新证据的突破口。三重证据专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字记载之外的活态文化传承，包括口传文学与民间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四重证据则专指考古发现的遗址和文物，特别是图像方面。将这四个方面的内容融汇一体的研究实践，直接引出文化大传统理论（指先于和外于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文本的多级编码理论等。

统一中国的史前观念：玉石神话信仰的文化认同作用

放眼全球，所有伟大文明的起源，没有一个不伴随着神话幻想支配的文明奇观：埃及金字塔与斯芬克斯像，巴比伦空中花园（神庙庙塔），奥林匹克火炬，克里特岛王宫，迈锡尼的黄金面具，中美洲玛雅金字塔等。对照之下，中国文明起源期的文化奇观既不在巨石建筑方面，也不在贵金属的冶金术方面，而是突出表现在切磋琢磨的玉礼器传承方面。如5300年前凌家滩80公斤巨型玉猪，玉龟壳夹持的八角星纹玉版，北方红山文化玉雕神祖像与南方玉雕羽冠神徽之类。还有延续五千多年，至今依然发挥经济作用的西玉东输路线——“玉石之路”（也即“丝绸之路”前身）。

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文明起源期覆盖的地理范围非常广袤，与尼罗河、两河流域和希腊半岛孕育出的偏于一隅文明古国截然不同。需要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能够不分地域、族属、语言的巨大差异，凝聚到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化干戈为玉帛，这一句古代熟语其实已道出此中奥秘。那就是认同到华夏文明自己特有的最高价值观。体现这种最高价值观的文献依据足够充分，但是却被西学东渐以来的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学史建构者们完全忽略掉了。如《论语》所记孔子的发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国语》中观射父对楚王解惑祭祀原理的“玉帛为二精”说，若套用普通百姓都能挂在嘴边的一句则是——“黄金有价玉无价”。结合四重证据法来看，二重证据方面以葛陵楚简为例。该简记载了战国时的楚人如何以玉器祭祷三位楚人先祖：（下图）

⧄玉，趣禱於三楚祇（先）各一痒（牂），[127]瓔（纓）之兆【玉】⧄乙三　41

需要认真思考的是，为什么礼神祭祖要以玉器为中介？为什么崇玉话语只出现在我们华夏，却不出现在世界五大文明的其他四个？以玉和帛为至高价值的国教信仰，究竟源于何时何地？项目研究成果表明，此类国家信念体系，建立在中国文明独有的两种物质互动基础上。从文明的基因构成看，先于普适性的青铜时代王权国家，还有一个更早更深远的玉器时代，该时代铸就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注定给文明发生提供不变的价值导向。诸如和氏璧故事（完璧归赵），卞和献玉璞故事，鸿门宴刘邦因玉礼而保命，周公手持玉璧玉圭和祖灵展开现场对话，姜太公垂钓渭河钓出玉璜等故事，史书中屡屡出现，读书人早已司空见惯，却未能有效反思其所以然。其实，这和一万年来玉文化在东亚大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史前玉文化的点线面传播过程靠什么因素得以实现？靠的是共同的史前神话信仰的认同力量。具体讲，以玉为神，以玉为天（赐），以玉为永生不死象征，这是一整套神话信念体系。此类观念的跨地域传播，在距今四千年之际覆盖到我国大部分地区。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是没有金戈铁马的精神统一的渐进过程。该过程要比众所周知的秦帝国武力统一中国，早出整整两千年，其重要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意义，不言而喻。

以往的国学传统受制于文献史学观，根本无法认识到这一场先于甲骨文汉字而存在的文化整合和凝聚过程。唯有走出已有的书本知识的束缚，跟随第四重证据不断出现的轨迹，才能走进前文字时代物证符号认知的广阔天地。这就意味着对大量史前考古遗址和文物的再学习，并由此展开辨析解读工作，在此基础上构建文化文本编码与再编码的本土化理论。迄今已出版三套丛书，以能贯通史前中国故事的玉礼器解读为重心，让玉礼器所讲述的万年故事，凸显世界文明发生史上的中国奇观。

对“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这个重要命题，现已逐渐形成有更为细化的认识推进：璧、琮、璜，加上锥形器和冠形器的完整玉礼体系，早在五千年前的环太湖的长三角地区就已率先完成。良渚文化之后辗转传播到中原，奠定了夏商周玉礼符号的基础。此种认识的递进，又推出基于环太湖地区田野调研的考察记类著作《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2021年），让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细化探讨，揭示出在无文字时代发生过的重大文化传播现象对文明起源的意义，并彰显被传统国学观忽略掉的一面：南方长江流域对华夏文明的贡献。如果要追问为什么史前玉文化的高峰没有出现在中原和北方，却唯独孕育在长三角地区？那一定和一万年前长江流域率先驯化出稻米，并在七八千年前开启养蚕缫丝生产等物质积累优势有关。

万年中国大视野的必要性

青铜时代的文化，仅从青铜时代的相关认识去看待是不够的。因为华夏的青铜时代距今也就是四千年上下。四千年的文化传统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找出青铜文化的前身和祖型，那就是国际上一般而言的新石器时代。世界各文明古国皆脱胎于此。在我国，介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有数千年之久长期积淀的一个玉器时代，目前能够彰显新石器时代中国特色的正是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可以说青铜时代所有重要的“铸鼎象物”之神话原型，均来自作为祖型的玉文化，而玉器时代的工艺传统是雕玉象物。当儒家创始人在青铜时代结束的东周之际，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八字真言隐喻表达君子理想的学习功夫时，其所沿用的不是青铜时代的话语，而是隔代传承下来的玉器时代的更早话语。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看，当今学人要想超越全盘西化的学术话语的遮蔽，恢复中国话语，一定要向儒道墨法诸家圣人的现实用语中去重新寻找。从玉石到青铜合金的演变，这不仅是材料和技术的更新换代，而且是玉石神话催生冶金神话观念的信仰变迁过程。玉石神话催生冶金神话，是一个前因后果明确的派生过程，此过程的因果变化绝不能倒置。所有称得上贵金属的物质，其进入冶金加工前的状态和玉石一样，也是石头—矿石。充分认识不可冶炼铸造的老石头神话——玉崇拜，到可冶炼熔铸的新石头神话——金属崇拜，这当然也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认知递进过程。不过大多数从事青铜时代研究的专业人士没有这样的学习经历。我们在文明探源研究的副产品“神话学文库”中专门翻译了冶金神话研究的国际权威性著作《熔炉与坩埚：炼金术的起源和结构》，意在普及神话观念驱动冶金术的相关研究成果。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国学传统的精髓，分不清源流关系，就无法建立确切而翔实的历史意识。如果说青铜器不是源，甲骨文不是源，皆为派生的或次生的文化现象，那么真正具有原型意义和文化基因价值的，需要诉诸更早的玉器时代的文化积淀。玉文化从距今一万年前的东北地区开启，到距今四千前中原青铜礼器出现，为接引后来居上的冶金文化足足铺垫了六千年时间，其意识形态的发酵作用相当可观。儒家圣人的“切磋琢磨”类话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类话语，皆提供出语言人类学方面的极佳例证。更不用说彰显华夏最高理想的成语“白璧无瑕”“冰清玉洁”“玉碎瓦全”等。“万年中国”新视野的俯瞰全局效果，有助于在文明探源方面厘清源流关系。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一万年前就有国家和文明，而是要与时俱进地彰显如下事实所蕴含的新知识：对于一个农业文明古国而言，其最核心的物质（小米、大米生产都始于万年前）和精神要素（玉帛崇拜）都是在距今一万年前就已经萌生的。万年文化共同体的知识创新意义，体现在将古今人惯称的“上五千年”知识，作为认清“下五千年”所以然的前提。

中国话语：本土文化理论体系

培育文明探源的交叉学科视野能给中国学术发展带来广阔空间。从国际学术视野看，我国文科的主要短板，是没有一整套能充分体现中国道路特点的本土文化理论体系。这体系应是百年大计，需从当下出发，脚踏实地，步步推进。从1993年尝试国学方法更新换代的三重证据以来，文学人类学界尝试建构中国本土文化理论系统的努力方兴未艾：从四重证据法论、神话中国论和神话历史论，到玉成中国论和文化大传统论，再到文化文本及其多级编码论等，一套能够引领交叉学科探索，兼顾宏观和微观的本土文化理论系统正在形成。“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神话学文库（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共130余种著作构成一个学术理论展示集群。

文化文本的建构以其史前时代的原编码为核心，必然受到神话想象支配。包括作为象形字的汉字产生，后世的文献书写，均要受制于先于文字的原编码（又称：文化的一级编码）。如何探究原编码时代的神话幻象？为文明探源而特别选出的一部译著是《萨满之声：梦幻叙事概览》，该书援引五大洲36位萨满医师的自述，解答上天入地想象和人—兽变形想象如何发生的学术难题。幻象，是早期人类仪礼行为的产物，萨满的治病与禳灾功能也是通过社会仪礼活动而兑现的。国际公认萨满现象源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社会，这就为文明探源研究提供出珍贵的精神遗产活化石。作为第三重证据，能够有效发挥对文物和文献的双重激活作用。至于神话宇宙观如何支配文化编码的问题，拙稿下面再以三星堆新出土文物为例略加说明。

2022年6月三星堆3号坑发掘出一件特殊青铜器，因为其罕见造型，专业人士暂名为“奇奇怪怪青铜器”。若从神话学视野看，或许并不奇怪，可称为四柱撑天形神坛。古人生活在自己的虔诚信仰的笼罩之下的，最关注的事就是祭神拜祖。三星堆的八个祭祀坑已有力证明：在古代中国，先民沉浸在自己幻想建构的神话宇宙中。由此，以文物造型的图像叙事为切入点，可以看到：1.神坛基本结构为上圆与下方的对应形式，体现天和地以及海陆空的三分空间。2.底部托举巨人，对应神话宇宙观中的海神（北方之神）禺强。3.四大圆柱象征表现支撑在天地间的四极。4.环绕四柱的有领璧形式，迄今首次昭示有领璧的使用场合，示范意义非凡。若结合后世以玉璧代表天门的象征传统，对照1986年出土青铜神树上的类似璧形设计，可知此神坛四极天柱与天门的组合方式别出心裁：划分天界与地界的分野。5.有领璧上的神兽，从升天动力方面考量，不属于凡俗下界的动物。对称的大角鹿（牛）和倒立的螭，表现升天神兽的天马行空特异禀赋。螭的虎首加走龙身形，兼具龙虎特征。与鹿（牛）组成三联升天意象，对应后世道教信仰的龙虎鹿三蹻。6.方形大地四边的12圆形符号，隐喻舆地神话观中的车轮形。其下牛首冠神人，对应《周易》坤卦的大地为子母牛联想。

三星堆虽有些不同于中原文明的器物表现，但仅凭玉帛二者的共在，就足以反驳一切外来说的观点。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个文明像华夏这样信奉君子如玉人格理想，也没有哪个文明像华夏先民那样养蚕缫丝。文明发生的独特道路，必然催生本土独有的话语，而今也将催生出中国自己的文化理论体系。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國學
本报教育部　主办
2022年第18期　总第633期

从人文学科深耕文明探源的中国性问题

□ 谭佳

2022年5月27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基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新时代的中国学者探索中华文明与前人气象自有不同，有着新格局与新使命：以工程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为“家底儿”，在全球化时代，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接下来，“加强多学科联合攻关”“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迫在眉睫。在多学科联合攻关中，以文学、文献学、神话学为主导的人文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置入文明探源与中国性之争，人文研究视角有着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中国性之争：文明起源、连续性和大一统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深刻揭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根基和要核，深刻阐释中国性，不仅历来是中国学界的重大研究课题，而且始终受国外学界关注，引发出各种争论，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中华文明起源与文明标志问题。距今9000多年，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两河流域的耶利哥（Jericho）；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开始冶金实践。距今6000多年，环黑海地区的瓦尔纳出现大量黄金首饰。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是距今5500年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距今4000余年，已知最早的成文法典《乌尔纳姆法典》、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在两河流域诞生，距今3000余年有了最早的成熟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考古学表明，中国最早的城市是湖南澧县的城头山遗址，距今6000多年；新疆古墓沟文化遗址表明大约4000年前中国进入青铜时代；标志冶金技术成熟的盘龙城和郑州商城青铜器，距今3600年；中国最早的书写系统甲骨文距今3200多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突破上述“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桎梏，根据中国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华文明的特性不是线性时间意义上的最先最早，而在于其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是在不断的文明交流与文化冲突中始终保持核心元素、历时最长的多元一体文化共同体。在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之后，我们仍然要探索：什么样的基础内核催生中华文明发生，如何发展，朝向何处；支配发展之路的中国性特质有哪些？这些重大问题需要有人文学科的协同合作。

第二，连续性与大一统问题。中华文明的大一统观念与连续性特征，在国内学界几乎是共识，但是，受不同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影响，在西方学界一直有争议。比如针对中华文明探源，西方有一批学者认为“把二里头遗址作为夏的做法是难以接受甚至是误导。”（刘星《缺席的对话》）部分活跃的汉学家，例如艾兰、杜朴、贝格利、罗泰、吉迪等都对夏朝实存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主张将文献记述与史实相区别。罗泰批评把“中国性”上溯到新石器时期找渊源的做法，认为用零散的证据来论证早期中国发展的连续性和单一性值得商榷。史嘉柏认为：“‘中国’这个词就是现在的中国，把它套在太早的时期上就是错误的。”陆威仪认为，“中国”是在秦汉以后，随着帝国的地理、军事和文化扩张才逐渐形成。薛爱华甚至认为，中华大一统是“想象”和“虚构”之物，更非中国历史的常态。除了对文明探源，汉学界对中国传统思维、早期文献的生成及特征也多有争论。前者以法国汉学界为代表，后者以柯马丁、鲍则岳与陆威仪、夏含夷的争论为代表。争论中的质疑派通过早期文化的口传特征和文本构建过程，解构圣人情怀和早期经典的价值同构。

无论是否刻意为之，这些汉学家质疑的是一个现代民族主义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何以能笼罩性阐释新石器时期的物质文化。其实质则是釜底抽薪，从中华文明根部否认商周以前的文化具有统一萌芽和统摄性因素，截断中华文明发展的信仰源头和内核萌芽，从学术效能上可视为对中国性的解构。顺此梳理，汉学界对蒙元史、新清史的争论也是典型表现，都呈现出“解构永恒的中国”（李零语）的诉求。正因如此，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面解答了第一个争议后，在多学科合作中直面争议，继续深耕中国性是必须推进的工作。

争议中的共识：基于文字记述与文化信仰的中国性

纵观各大古文明，从文明肇始至当下，只有中国的汉字一直传承使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形成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基因与价值认同。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蔚然壮观的文明现象，在事实上成为各派争论都必须认可的共识。

从国内学界争议看，即使对“中华文明未曾间断”持商榷态度的学者也承认：中国文明“未曾中断”说指向：“其一，族群入侵虽然带来中原文明的间歇，但并没有导致中原民族主体语言——汉语言——的根本改变或消失；其二，以传统汉语言写成的古典文献延绵不绝，保存至今；其三，由于传统语言及古典文献的保存，其所承载的传统价值观与信仰得以保存、延续。（张绪山《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吗?——传统史学谬见举偶之一》，《光明日报》2014年8月13日）

从国际学界争议看，前文的否定派们，比如鲍则岳承认，在文本和文献意义上的“中国”具有“共同体”意义。陆威仪虽然极力否定大一统，但是也认为“中国的皇朝（包括其在艺术、宗教上的反映）均是根据文本中的想象王国缔造而成的。”艾兰则认为，无法证明夏的真实，从文献分析，夏是商神话衍化的结果，具有政治构建和文化信仰功能。汉学家们认可，中华文化的共同体精神是依靠《尧典》《禹贡》《洪范》《周礼》等经典文本而构筑：“这些形象正好因为是文本上的理想，所以才特别适合跨时跨地的传承，这样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脉络。”（史嘉柏《近十年西方汉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若干争论问题》）

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通史——《剑桥中国史》首卷《中国上古史》也如此，即不承认夏朝，但是承认文化信仰意义上的中国有独特性，认为中华文献记述呈现出了“求统一的内涵”。因此，《中国上古史》卷《导言》的章节题目就叫《中国之理想化的过去》。撰写者们认为：“按照这种理想化了的古史观（指周代文献记述的三代盛世），自上古时代以及其后的两千余年的王朝历史，一直都有一个求统一的内涵。”该章作者梳理出从新石器时代到先秦，曾出现统一国家的萌芽：“这些萌芽至少会显现在包括政权及其所需要的宗教信仰、礼仪和思想等诸方面。这些萌芽发展了以后，社会阶级和有效的政治机构出现了，它们吸收了各种外来的文化因素，一个知识分子领导阶级也随之而产生。这个普遍受人尊敬的领导阶级是以他们的文学知识，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宗教特权发展出来的。和其他文明相比，这些萌芽中，有一些方面肯定是有其独特性的，从春秋时代开始就产生，可世界上其他地区从未见到的一种持续的、统一的文化。”（*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这些论述无疑承认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和统一性源于史前的信仰和仪式萌芽，通过汉字记述，表现在文献记载与思想理念中。虽然汉学家们的诸多观点不乏偏执与极端，他们的共识也一再提示国人：在文明探源工程取得重大成果之后，尚需深耕从史前到当代、器物到文字，从文献经典到精神理念、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明，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中国性内涵。

回归文化大传统，从人文学科深耕中国性

围绕文明起源研究，国内还是最倚重考古学和历史学，前者尤甚，其余学科介入不足。中华文明探源的重大意义在于揭示出相对文字出现的3000余年小传统，涵盖文明起源期在内的史前文化构成更深远悠久的文化大传统，中国性的所有特征在大传统中都能找到萌芽和发展线索。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曾系统分析了中国文字以及思维的特色，以对应西方的神学体系。他认为具有占卜功能和神权意义的甲骨文，是中华史前物象观念和文化信仰顺势发展的结果。庞朴先生曾指出，中国人思维结构与汉字的使用有深层结构上的一致性。诸如“立象尽意”“铸鼎象物”“文以载道”等观念都是中华文明取象思维的表现方式，其天人合一的丰富内涵对现代性文明有巨大的启示意义。换言之，滋生中国文字出现的深厚史前传统及其文字背后的信仰、礼制和观念特性造就了持续、统一的中华文化。“中国文明表现为最浓厚的‘信仰—仪式’统一体和稳定共同体特色，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杜维明《试论中国哲学中的三个基调》）“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而西方文明的发生是突破性的。因此社会科学中照搬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徐苹芳、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针对中国性之争，文明探源工程成果虽然奠定和夯实了研究基础，但是，当下盛行的考古学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不足以完全回答信仰与观念问题，不足以挖掘中华文明延续性和大一统特征之全然面貌。

从学术范式和人文理论构建来看，在现当代学界，最常见的中华思想史研究惯于套用西学古典进化论的“神话→历史”“信仰→理性”“宗教→理性化”“神圣→世俗”的演进过程，用现代性工具理性观来规避中国王制中的“神—人”关系和礼乐文化渊源。这类西学而来的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式，解释不了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独特性。其实，已经有考古学者谈到应结合神话学、文献学构建探源新理论：“‘如何重建古史传说的历史’——这应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在方式与目标方面区别于西方而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重要内涵之一。”（朱乃诚《21世纪初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特点、成果与展望》）著名考古学家沙雷尔曾论述，“以前的考古学界一直不重视意识形态，认为这是考古学研究力不能及的……人类社会借助意识形态确立关于自然和超自然世界的信仰体系。通过意识形态，形成了关于宇宙的秩序，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的观念，确立了人与人以及人与周围万事万物的关系。意识形态是用象征符号来表达的，分析抽象的实物象征和写实的实物象征。”（罗伯特·沙雷尔、温迪·阿什莫尔《发现我们的过去：考古学》）这些论述都突显出考古学结合人文研究势在必行。

若要勾勒从史前到当下的象征符号，研究有关文明价值、文化观念、历史思想、意识形态等中国文化内核问题，是无法简单用传统注疏考证（经学）或纯物质文化（考古学）、田野调查（人类学）以及针对成熟宗教信仰（宗教学）的研究范式来推进的。围绕物质、文献与文本精神的综合探索需要以人文学科为主导的多学科合作。这方面，文学领域的交叉学科——中国文学人类学学派已经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了文字产生以前的文化大传统，利用史前物质文化实物来解读其隐含的观念信息，考察中华文明的观念因子、器物的文化意义和“道—器”之间的思想生成。这些实践仅是开端，探索中国性仍存有大量深耕空间，尤其需要关注被前人所忽略的文明信仰与观念驱动问题，尽早弥补国内外研究空白，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共性和特性与后世文献、文学精神、文化观念等进行全面衔接。同时，中国文学研究也需要借之全面反思国际汉学界对早期文献研究的利弊得失，构建文明探源与中华文艺、中华文化互补共生的多学科交叉新模式。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需要“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亟须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从人文学科路径深耕中国性问题，这是无法回避的时代之问和研究使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文化战略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